

· 外论摘编 ·

## 试析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下)

爱德华多·德维斯-巴尔德斯 里卡多·梅尔加-鲍

### 关于阿普拉主义

在20年代,阿亚·德拉托雷强调,较之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阿普拉党在其组织及政治结构上更类似于中国的国民党,他还对孙中山著作发表了评论,指出了后者对他本人思想以及阿普拉党的启发。据阿普拉党创始人之一费利佩·科西奥·德尔波马尔(Felipe Cossio del Pomar)说,一位美国作家曾问阿亚,“阿普拉党可与何种政治组织相比,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阿亚大概回答说:“它不像前者也不像后者,或许,阿普拉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足以说明它的性质。但如果做个类比可以让您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运动,我可以把它类似于国民党。”据阿亚传记作者说,阿亚明确指出了两者相似的理由:

“我们同中国一样处在一个变革的关键时期,一个从保守国家向进步国家转变的时期……中国革命不仅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间斗争的结果。它也削弱了外来的文化侵略,锤炼了中国的自身文化,从欧洲文化中吸取了必要的武器来对抗威胁、摧毁中国文化的帝国主义。”

随后阿亚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革命与秘鲁革命的相似性及其对后者的启发:中国革命“完成了对那些在5000年的渐进中建立起来的、不能被西方文化超越的准则的辩证的转变”。实际上,孙中山所做的是“确定新思想的方向……新文化的主旨是新民族主义,它认为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只是人类社会的半成品”(Cossio del Pomar, 136-137)。1927年,阿亚在牛津期间写道:“我认为在1926年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阐释了的国民党纲领值得了解,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实现经济民族化、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现实主义计划。”(1936: 134)

阿亚政治思想中这种无可争议的(对国民党的)借鉴,在随后几十年阿普拉党的理论表述中逐渐消失。1954年,在阿亚所作的题为《阿普拉

主义的三十年》的对阿普拉主义运动前几十年意识形态及政治建设的总结中,已经没有国民党的任何痕迹。蒋介石已经不是引起好感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排斥、偷换并篡改了孙中山的理想和统一阵线纲领,也因为国民党已被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败。

在二三十年代的文章中,阿亚谈到了他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以及自己对甘地的评价。通过罗曼·罗兰,阿亚还曾与泰戈尔及其秘书卡利加斯·纳格(Kaligas Nag)互通邮件。

1930年,印度问题,或换言之,由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拉丁美洲的影响继续滋养着阿普拉主义的反帝观点。路易斯·埃森(Luis Heysen)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光明”文学会的讲坛上所作的关于甘地的演讲证明了这种影响的存在。这次演讲的建议出自几位受巴尔布希亚诺英雄主义(barbussiano)影响的文学会领导人,他们是安东尼奥·萨莫拉(Antonio Zamora)、卡洛斯·桑切斯·比亚蒙特(Carlos Sánchez Viamonte)、何塞·佩内隆(José Penelón)。埃森在另两篇核心论文中也坚持了这一观点。第一篇将印度甘地事件作为自己政治理念的实质部分之一,他说:“……我坚定地宣布我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我支持这场震撼了青铜种族的印度的事业。”(Heysen, 1930: 15)埃森在第二篇论文中阐述了这位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公开异议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的世界影响:“甘地是代表他们民族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一位战士和人民的代言人。因此,否认他所领导的斗争具有革命意义,就是对革命科学缺少最起码的常识。”(Heysen, 1930: 16)

毫无疑问,圣雄甘地及其国大党所开展的斗争经历引起了阿普拉主义者的追随和崇拜。在阿普拉主义者的心目中,甘地与阿亚是近似的甚至是并驾齐驱的人物。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阿普拉主义曾试图与甘地的运动对话或至少是交流思想。印度方面

则有偶尔提及阿普拉主义的迹象。阿根廷东方学者、亚洲学会中负责在印度知识分子中传播阿普拉思想的弗朗西斯科·A·普罗帕托(Francisco A. Propato)似乎于1933年访问过印度。一位阿普拉主义者的发言人肯定了这种说法,并略带夸张地说:“阿亚·德拉托雷得到了圣雄甘地的好感和理解。”(Apra, No. 6, 1933: 13)

### 拉丁美洲对亚洲思想家的解读

我们在下文将提供一张简图,列出一些拉美作者或组织所接受的亚洲思想,并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和研究线索,希冀人们了解有待研究的广阔天地。换句话说,我们重申进行概述的目的是为那些必然涉及一些亚洲人物的研究者提供一种浅析。这些亚洲人物在我们大陆的思想、政治等领域都曾留下影响,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到过这里,如罗易和片山曾到过墨西哥,泰戈爾和克里希那穆提曾到过阿根廷。

#### (一) 泰戈爾与尼赫魯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爾曾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拉丁美洲作家熟知的短篇小说家、唯灵论思想家。人们渐渐认识到,他是一位更广义的思想家:他关注民族主义、印度独立以及边缘世界的问题。他于1924年受邀参加秘鲁独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由于突发的健康问题以及同女东道主维多利亚·奥坎波可能存在的短暂恋情让他延长了在阿根廷的中转时间而没能到达秘鲁。维多利亚·奥坎波写道:“泰戈爾在圣依西德罗我的家中住了两个月,他经常唱他们的歌给我听,开始我觉得无比单调,如同高乔人(gaúcho)的一种舞蹈马兰博,但渐渐地我习惯了那些歌曲,并开始喜欢上了它们。”(Ocampo, 1978: 19, 56)泰戈爾与奥坎波确实通过信,有人研究过其中一部分信札,这些通信证明存在着一种交流思想的网络,书信往来和《南方杂志》(Revista del Sur)上的文章都是思想交流的表现形式。

贾瓦哈拉尔·尼赫魯被认可是与甘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认为他与甘地不同,一方面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第三世界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提及尼赫魯的拉美作者对这位印度总理的著作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尼赫魯与拉美知识分子的相遇,是在他出席的首届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大会上(布鲁塞尔,1927年2月)。几位拉美与会者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欧多西奥·拉维内斯

(Eudósio Rabines)、塞萨尔·法尔孔(César Falcón)、维克多·劳尔(Víctor Raúl)、阿亚·德拉托雷、维多利奥·柯都维亚(Victorio Codovilla)、卡洛斯·基哈诺(Carlos Quijano)及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他们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尼赫魯的名字。有趣的是尼赫魯在自传中虽记述了参加此次大会的拉美学者,却同样没有提及姓名。他写道:“有一位激进总统和实行一种激进政策的墨西哥人急于成为拉美代表团反对美国的领头人,因此墨西哥对布鲁塞尔大会非常感兴趣。墨西哥政府未能正式出席大会,但是派了一位重要的外交官作为和蔼可亲的观察员与会。”(Nehru, 1941: 124-125)他对于拉美参会者的记述仅限如此。拉美人对亚洲人来说微不足道,就如同亚洲人对拉美人的影响一样。<sup>①</sup>

后来这位印度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问世的他最早的三部曲《苏维埃俄国》、《我的自传》与《发现印度》中提出了早期反帝激进主义,在冷战高潮时期提出了既不靠拢美国也不靠拢苏联的第三种立场,这些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原因在于拉丁美洲知识界自由主义与民众主义潮流对之缺少关注。此后情况起了变化,1959年这位印度领导人对苏联表示出鲜明的批评态度,与其拉开距离,这一态度在拉美各国受到欢迎,得到传播。“争取文化自由大会”会刊作了有关报道并发表了一篇少见的倾向性明显的社论(Cuadernos No. 36, 5-6, 1959: 2-8)。

#### (二) 毛泽东、胡志明与金日成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拉丁美洲共产主义出版物中出现了有关毛泽东的内容,但其出现主要在(1954年)斯大林死后,在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争论以及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之后。1959年(中共与苏共间的)争论公开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各国共产党,同时这些共产党也受到了具有多种色彩的古巴革命胜利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分歧点在于:斯大林的遗训、东西方和平共处的理论、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政党与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上述分歧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公开化,并主要通过苏共与中共的外文出版物在拉美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同反响。除了发表

<sup>①</sup> 此处及所有非西班牙文著作的文字,均为作者所译成西班牙文。

有关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分歧的大量文章外,《毛泽东选集》也传播到了拉丁美洲。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各拉美左翼组织中存在着中国、越南与朝鲜等东方政治领袖和思想家的影响,他们的影响程度正如文中顺序所示。上述影响持续了整个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的秘鲁,毛泽东思想在“光辉道路”中的影响非常明显。

胡志明在越南战争时期获得了极大关注。作为一个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象征,他的形象远比其著作影响要大。胡志明启发了反帝理论,也可以说他为反帝理论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在拉美左翼中没出现如之前出现的“中国派”或“阿尔巴尼亚派”一样的“越南派”。可能从理论上更具影响力的是战略家武元甲,其著作曾被智利阿连德执政时期的 Quimantú 国家出版社以及墨西哥 Grijalbo 出版社发行。胡志明及其他越南政治家、知识分子著作的译本通过两个途径传播:一是由河内外文出版单位出版发行,二是由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自行出版发行。

奥斯卡·克雷特(Oscar Creydt)是一位巴拉圭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中吸纳了大量胡志明与武元甲著作的内容,他确曾赴越南学习上述著作。这位巴拉圭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其政治思想及其领导的巴拉圭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深受上述两位越南领袖人物的影响。克雷特与越南领导人黎笋(Le Duan)<sup>①</sup>及(武装力量)参谋部领导人的关系为克雷特在制定巴拉圭斗争纲领时提供了特殊的顾问作用。正是黎笋为克雷特打开了通往中国、接近毛泽东那个圈子的大门,使其不久后成为拉丁美洲毛主义先驱之一。(Creydt, 2002: 241-243)

胡志明及武元甲的著作还深深影响了一位70年代拉美游击队运动主要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他就是阿根廷人马里奥·罗伯托·桑图乔(Mario Roberto Santucho)。还应提及越南关于社会问题的著名专家黎笋在围绕区域问题的争论上产生的思想影响。黎笋曾任秘鲁阿尔瓦拉多政府(1968-1975)的顾问,参与制定了区域规划模式及国家北部发展规划。黎笋在秘鲁大力推行一种与越南重新统一时期类似的模式,采取以工业地区为主,农业地区为辅的政策。

金日成对拉美的影响明显没这么大,但我们仍能找到相关文章,如秘鲁人赫纳罗·卡内罗·切卡(Genaro Carnero Checa)出版的关于北朝鲜“主体

思想”(Zu Che)<sup>②</sup>的书。金日成不同于影响了热那游击队经验的、拉美大学反叛青年的前几位亚洲人物。金日成的著作只是被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出版、引用。他从来被视为北朝鲜的国家领导人,而不是一位革命领袖或革命先知,他缺少前两位越南人物身上的浪漫特点。

(三) 几位东南亚作者:黎萨尔(Jose Rizal)<sup>③</sup>与苏加诺(Sukarno)<sup>④</sup>

东南亚(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作者在拉美鲜少有人问津。莱奥波尔多·塞亚是少数在其著作中写进了黎萨尔和苏加诺等人物的作者之一。

塞亚为《阿亚库乔丛书》收入的黎萨尔的小说《请别碰我》作序。塞亚尝试介绍这位菲律宾人与拉美“解放者”玻利瓦尔的对应性和相似性,特别是如文所示,将黎萨尔与其在美洲的何塞·马蒂相比。塞亚提及黎萨尔是为了展示另一些反殖战士的视角:“那些与他们的统治者有联系的人们使世界听见了自己的呼声。他们的历史完全是处于依附状态的人民的历史”。菲律宾人民的要求“同面对费尔南多七世的西班牙美洲人民的要求一致,他们仅仅要求成为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Zea, 1982: XVIII)。要求平等、追寻民族根源(1982: XXI),对混血意识(1982: XXII),希望唤醒觉悟(1982: XXII),这些是塞亚从黎萨尔身上发掘出的教诲,塞亚称“这位作家,这位思想家,这位英雄,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西班牙美洲人”,“我们试图将黎萨尔归入我们美洲的文化、思想和文学”,应该将他列入玻利瓦尔(Bolívar)、贝略(Bello)、萨米恩托(Sarmiento)、比尔瓦奥(Bilbao)及冈萨雷斯·普拉达(González Prada)等人的队伍(1982: XXX)。

① 黎笋(1907—1986):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曾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译者注

② 主体思想(Juche Idea):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朝鲜劳动党建立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英文也称金日成主义(Kimilsungism)。由金日成创立,并经黄长烨加以体系化。该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也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亦即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译者注

③ 何塞·黎萨尔(1861—1896):菲律宾国父,民族英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思想家,作家,诗人,医生和雕刻家。——译者注

④ 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尼西亚建国领袖及首任总统,其长女梅加瓦蒂为第五任印度尼西亚总统。——译者注

在《历史进程中的美洲》一书中，塞亚提出了苏加诺所维护的民族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一旦被非西方人民接受，即遭到西方人抨击”的民族主义。塞亚引证苏加诺的话说，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解放性效果”。塞亚对苏加诺的了解和阅读要比对黎萨尔多，他们两位都“受西方影响，从西方著作中获得了自由的观念”。塞亚从这个角度引述了这位印度尼西亚人的一段话：

“那些不了解殖民历史的人们，无从了解其对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能从农业、经济、政治层面评估殖民地国家所受到的影响，但殖民主义对个体思维方式和精神的影响却无法估量。请仅从这个方面去体会殖民主义。几代殖民地政治领导人一直致力于消灭殖民主义制度。如果想理解亚洲和非洲，我们就应去了解民族主义”（Sukarno, 1956, 引自 Zea, 1970: 89-90）。

塞亚认为苏加诺抵抗的意义：“不是反对西方文化精神，而是反对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否定着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Zea, 1970: 91）。

#### （四）林语堂

中国哲学家林语堂（1895-1976）的著作《生活的艺术》英文版于1937年出版，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南美洲出版社于1940年再版。据两位热情的本书内容简介者和出版者所言，这本书在40~60年代初的拉美超越了学术范畴。这里指的是阿根廷人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拉努萨（Eduardo González Lanuza）在1940年及智利人曼努埃尔·甘达里利亚斯（Manuel Gandarillas）在1962年写下的文字。冈萨雷斯恰当地描述这部中国哲人的著作，用欢快的人间常识与平和的东方式反讽，反衬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拉美主要城市居民生活的现代西方化城市常规。文中写道：

“生活的艺术是体现在富有耐心的中国人民身上的生活圣经，他们天生具有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圣灵，就像一句精彩的谐音俏皮话所说——今天它显得格外正确——常识是最不寻常的意识，它是最纯真的幽默感的无尽源泉……而我们自己的悲剧则看来有些俗气，我们的文化野心好似暴发户的焦躁，我们企图无限超越的宗教思虑也染上了淡淡的滑稽色彩。”（González, 1940: 81）

#### （五）哈里利·纪伯伦（Khalil Gibran）

叙利亚—黎巴嫩人哈里利·纪伯伦（Khalil Gibran）同林语堂一样有别于前面几位，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诗人、神秘主义者，他可以纳入20

世纪前几十年以泰戈尔、辨喜以及神智学为代表的东方精神思想的广泛影响中。纪伯伦在精神领域和兼有宗教和世俗色彩的伦理领域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未能成为一种更加系统的思想影响。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回忆说“南方人”是通过哥斯达黎加出版的《美洲一览》认识纪伯伦的。哥斯达黎加人何塞·布雷内斯·梅森（José Brenes Mesén）在这件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为纪伯伦写了序言。（Gabriela Mistral, 1999, Tomo 1: 37）

#### （六）杂闻

还有一些并非由个人代表的东方思想影响。我们注意到阿亚·德拉托雷谈到过国民党的思想，尽管他实际上仅仅涉及了孙中山的著作。也有人提到过万隆会议（1955年）以及开罗会议（1957年）等，但较少涉及其理论内涵。此外也有对共产党的评论，偶尔也提及了周恩来及林彪，但都不是把他们作为思想的启蒙者，而是在涉及中苏论战时提到了他们，或把他们作为冷战环境下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提及的。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基布兹”与合作制度对拉美可能产生的意义引起了一些拉美作者的思考。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ábato）、费利佩·埃雷拉（Felipe Herrera）、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sup>①</sup>等人提出把以色列经验作为一种模式的价值——指一个民族的经验，而非某位作家的思想。智利人费利佩·埃雷拉认为，1955年“以色列为那些新诞生国家提供了一个范例，它努力在一种尊重宽容和自由原则的共处框架中改变有限的现存生活条件”。埃雷拉甚至还将以色列称为“对20世纪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Herrera, 1955: 95）

#### （七）2000年前后的情况

20世纪末对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东方思想是“庶民—后殖民”思潮。印度人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拉纳古特·古哈（Ranjit Guha）、迪皮特·查克拉瓦蒂（Dipesh Chakrabarty）、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霍米·巴巴<sup>②</sup>

<sup>①</sup> 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阿根廷现代文学先驱，散文家、小说家，20世纪重要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隧道》《英雄与坟墓》等；费利佩·埃雷拉（1922-1996）：智利学者、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恩里克·杜塞尔（1934-）：生于阿根廷，现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任教，主讲伦理学。——译者注

<sup>②</sup> 最早提出“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几位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学家。——译者注

以及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Said)<sup>①</sup> 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中间, 关心社会运动尤其是性别问题的人、关注欧洲中心论及全球化等问题的人也常提及这些人的名字。对此格外强调的, 是一些在美国从事拉丁美洲问题研究的拉美(裔)人, 尤其是与伊比利亚美洲文学国际研究所以及《伊比利亚美洲文学杂志》有关的学术圈: 马贝尔·莫拉尼亚 (Mabel Moraña)、瓦尔特·米戈诺洛 (Walter Mignolo)、费尔南多·科罗尼尔 (Fernando Coronil)、伊莱亚娜·罗德里格斯 (Ileana Rodríguez)、莱昂内尔·德尔加多 (Leonel Delgado A.)、马里奥·罗伯托·莫拉莱斯 (Mario Roberto Morales)、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Arturo Escobar)<sup>②</sup>。此外, 像西尔维娅·里维拉·库斯坎基 (Silvia Rivera Cusicanqui)、罗萨娜·巴拉甘 (Rossana Barragán)、埃德加多·兰德尔 (Edgardo Lander)、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戈麦斯 (Santiago Castro Gómez)、阿尼瓦尔·基哈诺<sup>③</sup>等属于其他领域或其他圈子的人, 也在各自的近期文章中涉及了上述亚洲人 (Lander, 2000)。

有关全球化的研究, 日本人大前研一 (Kenichi Ohmae)<sup>④</sup> 的著作常被右翼引用, 他研究过跨国公司问题、世界经济的特点问题以及国家民族的终结问题 (Ohmae, 1997)。

在经济领域内,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 人们通过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的出版物了解到印度人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思想。不久, 人们又了解了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ad Yunus) 有关非正规经济及孟加拉贫困人口的思想。穆罕默德·尤努斯针对赤贫人口的小额贷款主张 (Yunus, 2000) 影响了包括一些拉美国家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脱贫项目。不同机构的、立场各异的研究人员都从尤努斯那里得到了启发。

### 初步总结及几点结论

1. 我们试图通过这篇简述确立一些重要的发展阶段, 介绍一些人物及其影响范围, 根据时间、思想及学科标准划分出一些“区域”。

毫无疑问, 在 20 世纪不断变换的世界背景下亚洲与拉美所处的边缘化地位, 造成了两者间思想交流的薄弱和不连贯性, 造成了两大陆人员往来、知识与政治网络建设方面的局限性, 这种情况是长期存在的。然而, 即便拉丁美洲对亚洲思想及其文化思想境界的接受很有限, 但是亚洲思想影响仍然

在拉美造成了一些知识分子与政治流派, 并曾在该地区引发了一些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全国性事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亚洲思想在质量和数量上还很匮乏, 但在面对欧洲与北美的亚洲思想研究成果时, 我们对拉丁美洲所接受的来自亚洲的多元影响也不应视而不见。赛义德准确分析了欧美东方学家的所谓博学, 认为西方第一世界在权力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殖民化特点, 也造成了(研究中的)框框和烙印。另一方面, 不平衡且具争议性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并没克服大陆内及大陆间思想隔阂、缺乏交流与各唱独脚戏的状况。从长远来看, 南—南思想交流与南—南对话仍有待于在共识及新的更好的基础上不断加强。

2. 拉美人所读到的并按自己的方式解读的亚洲思想家是他们当中最西方化的、色彩最混杂的一些人物。我们所言之混杂有两三种意义: 拉美人是通过阅读西方语言译文了解亚洲思想的, 而这些非亚洲译者在译文中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 拉美人有时是通过评论者或介绍者、而不是通过阅读著作本身了解亚洲思想家的, 如对片山、甘地、毛泽东或哈里利·纪伯伦的了解就是上述两种或三种意义上的混杂的鲜明例证。

如果我们注意到 20 世纪初拉丁美洲学者所了解的印度教及神智学是一种已被西方学者大加改造过的思想, 那么上述结论则更加清晰。(Fischer, 1974: 341 ss.)

也许说明上述结论更有力的例子是克里希那穆提, 他在西方人的培养、教育下, 形成了一种西方人创造的克里希那穆提“东方主义”; 另一个例子

① 爱德华·赛义德 (1935 - 2003): 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 美国当代重要的批评理论家, 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人物, 主要著作有《东方主义》等。——译者注

② 马贝尔·莫拉尼亚: 乌拉圭人, 从事拉丁美洲文化、殖民文学、文化研究, 拉美文化评论及相关领域图书编撰工作; 瓦尔特·米戈诺洛: 阿根廷当代文学评论家, 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学与文学理论; 费尔南多·科罗尼尔: 委内瑞拉当代作家, 学者, 主要研究后殖民问题; 马里奥·罗伯托·莫拉莱斯: 危地马拉当代作家、学者、记者;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 哥伦比亚当代社会学家、教授。——译者注

③ 西尔维娅·里维拉·库斯坎基: 玻利维亚社会学学者、教授; 罗萨娜·巴拉甘: 玻利维亚历史学家; 埃德加多·兰德尔: 委内瑞拉当代社会学学者、教授; 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戈麦斯: 哥伦比亚 Javeriana 大学哲学教授, 主要研究社会哲学、拉美思想与拉美文化。——译者注

④ 大前研一 (1943 - ):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评论家, 少数获得国际肯定的东方管理学家, 主要著作有《战略家的思想》《无国界的世界》。

是甘地。甘地曾写道：“那些全面影响过我生活的人，总体上来说有托尔斯泰、罗斯金（Ruskin）、梭罗（Thoreau）和瑞强德拉（Raychandbhai）”<sup>①</sup>（Jahanbegloo, 1998: 9）。有人这样描述甘地：“在伦敦读大学时，他最早是通过阅读英国诗人记者爱德温·阿诺德爵士（Sir Edwin Arnold）的《亚洲之光》一书以及研究《簿伽梵歌》（Bhagavad Gita）认真从思想上了解印度教的。那个时期甘地经常出入伦敦素食者的聚会场所，在神智学会认识了安妮·贝森特及布拉瓦茨基夫人”（Jahanbegloo, 1998: 119）。这一点又回应了上文所述：这篇论文仅涉及了亚洲人的思想，并未刻意论及存在一种亚洲思想本质。

3. 亚洲思想通过不同的途径流传到拉美：神智学会、北京的外文出版部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同时，出现了许多希望促进不同文化和不同大陆间对话的各层次上的机构：如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第三世界论坛、南—南历史发展研究交流项目（SEPHIS）。同时，拉美研究在亚洲特别是在日本、印度及中国的发展，也促进了相互交流。

对于传播亚洲思想，北美研究机构的作用日趋重要，这种重要性尤其表现在对“后殖民”著者的研究，当然北美的亚洲思想研究的进展也没有仅局限于“后殖民”问题。“后殖民”著者已在拉丁美洲广为流传，其传播方式大多是通过美国的拉美侨民。那些“后殖民”著者们大多居住在第一世界的英语国家，他们用英文写作，他们所受的教育深受这种环境影响，同时他们也在这些国家的学院得到了学术共鸣。

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谈及的亚洲思想越发不是真正的或纯粹的“亚洲”思想，不是用母语叙述的东方哲学或东方精神。我们更多涉及的是由亚洲问题引发的一种思想。换言之，我们在谈论亚洲思想时，更像是在谈论一种“边缘”的思想，而不是在谈论一种“本土”的思想。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些著者居住在中心世界，从中心世界出发提出问题，他们有能力鼓励一种第三世界激进主义。这一点无疑使人们对“边缘知识分子”的概念产生怀疑，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从多种意义上来说，“边缘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与中心的辩证关系中存在的。

然而，这还不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第一世界英语国家学术机构作用的唯一例子。这些国家的学术机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很重要。它们在前英

语殖民地和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学家间起了纽带作用。英语国家的学术机构吸收的学生和教师促进了同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联系；如果没有这类英语国家的学术机构，拉丁美洲本不会与这些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目前这种程度上的接触。换言之，第一世界学院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间网络的搭建和南—南世界的思想交流。

在拉丁美洲吸纳亚洲思想的过程中，克里希那穆提、罗易、Jinajaradasa、泰戈尔及片山等人在拉美的短暂停留或访问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而在赴东方访问或在东方停留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中间，我们应记住墨西哥人胡安·何塞·塔布拉达、米盖尔·科瓦鲁维亚斯（Miguel Covarrubias）与奥克塔维奥·帕斯，智利政治家罗宾逊·罗哈斯（Robinson Rojas），厄瓜多尔—秘鲁人卡洛斯·卡斯蒂略·里奥斯（Carlos Castillo Ríos），乌拉圭人奥斯卡·克雷特，他们只是一些例子。

4. 传统上，拉美在两个领域吸纳亚洲思想：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精神领域探求什么是美好与和谐的生存状态。最近又出现在了另一个领域：关于后殖民的世界性的领域。

在政治领域有影响的亚洲人物有：罗易、片山、毛泽东、胡志明、武元甲、孙中山；在精神领域有泰戈尔、辨喜、克里希那穆提及纪伯伦。甘地是个跨界人物，其政治主张与其精神世界有紧密的联系，如非暴力、积极或和平的抵抗，“坚持真理”（Satyagraha）。

从事拉美思想现象分析（eidología）和拉美思想史研究的人对于政治思想领域的兴趣明显比对精神领域的兴趣更大。直白地说，不存在研究精神性的拉美思想研究；婉转地说，几乎没有关于美好与和谐生存状态（不是指伦理上或乌托邦式的思考）问题的研究。少数研究涉及了爱丽儿主义之类的问题。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人（受到东方思想启发而提出的）关于和谐生命的论述没有被现代分析者们从精神性的角度阅读。加深从精神角度的研究将更好地揭示亚洲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能揭示我们思想中的西班牙文化遗产。

<sup>①</sup>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著名的学者、作家、艺术评论家，而且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及建筑方面的专家；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著有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又译为《消极抵抗》、《论公民的不服从》）。

5. 我们把这篇文章定义为简述。我们的初衷很明确,既不想描述东方学者的研究工作,也不想描述另一类人的工作,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学天赋,曾去东方旅行,产生了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旅行趣闻的迫切愿望。

这篇以研究为目的论文没有忘记那些专业东方学者、东方文化传播者、见闻作者、诗人或小说家,他们的成果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有助于我们理解拉丁美洲人感受亚洲人的方式,以及拉丁美洲人描摹他人形象和他人类型的方式。这些人的作品为那些对与“他人视角”有关的思维方式和问题感兴趣的人们,留存了大量资料来源。

6. 对亚洲思想在拉美影响的探究和简述,意在展现我们思想来源的多样性,超越仅将我们与更西化的欧洲联系在一起狭隘视野。我们的思想

中,不断容纳进北美的思想、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思想、斯拉夫欧洲的思想、辽阔而又多样化的亚洲思想,以及某些非洲思想。

研究拉美思想与其他文化思想联系——或通过知识分子、政治家间的交往、或通过思想的传播、或通过其他方式——的学者,希望在这篇或其他文章中呈现一个比学术界的老生常谈更广阔的思想世界。拉丁美洲成长了(如安第斯美洲、中部美洲、亚马孙、加勒比、中美洲地区、南锥地区等概念的增多),它与外部的联系也成长着,并日益多样化。

让我们继续努力,把认识论从陈旧的范式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们限制现代认识论学科的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美洲的认识,萎缩了我们的自我形象。

(翻译 韩晗;校译 刘承军;责任编辑 黄念)

#### 主要参考文献

- Javier Alzérreca-Frambes Buxeda, "La voz de Puerto Rico articulada por Pedro Albizu Campos (1891-1965)", *Homines* (San Juan de Puerto Rico), Vol. 13, No. 2, Vol. 14, No. 1, agosto-agosto, 1989-1990, págs 253-266.
- Casañas Marta Elena, "Las Redes Sociales de Mujeres Guatemaltecas en la Década de 1920", en revista *Universum*, No. 16, Universidad de Talca, 2001.
- Antonio Caso, "Lao Tse y el Pensamiento Chino", *El Universal* (México), 24 de enero, reproducido en *Obras Completas VIII*, UNAM, México, 1975, pág 273.
- "La Persona Humana y el Estado Totalitario" (1941) en *Obras Completas VIII*, UNAM, México, 1975 (prólogo de Mario de la Cueva, compilación de Rosa Krause de Kolteniuck).
- José jr. Castillo, "¿Confucio en nuestra casa?", *Repertorio Americano* (San José C. R.), No. 12, 1 de febrero, 1921, págs 170-171.
- Carlos René Correa, "Rabindranath Tagore", *El viaje* (Santiago de Chile), No. 137, marzo, 1945, págs 98-100.
- Felipe Cosío del Pomar, *Haya de la Torre el Indoamericano*, América, México, 1939.
- Óscar Creydt, *Formación histórica de la Nación Paraguaya. Pensamiento y vida del autor*, Ediciones, 2002.
- Asunción Cilihue, "Jawaharlal Nehru y el Comunismo", *Cuadernos* (París), No. 137, mayo-junio 1959, pág 2.
- Eduardo Devés, Ricardo Melgar, "Redes Teosóficas y Pensadores (Políticos) Latinoamericanos 1910-1930", en *Cuadernos Americanos*, No. 78, año 13, Vol. 6, noviembre-diciembre, 1999.
- Eduardo Devés, *El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en el siglo XX: Del Ariel de Rodó a la CEPAL*, Tomo 1, 2000.
- Buenos Aires Biblos, "El Aprismo Irá a la India", *Apra* (Madrid), No. 6, Agosto de 1933, pág 13.
- Vicente Fatone, Intervención en "Debates Sobre Temas Sociológicos: El problema Gandhi", *Sur* (Buenos Aires), No. 198, 1942, pág 87.
- Luis A. Ferrao, "Pedro Albizu Campos, el Partido Nacionalista y el Catolicismo 1930-1939", *Homines* (San Juan de Puerto Rico), Vol. 13, No. 2, Vol. 14, 1, agosto-agosto, 1989-1990, págs 224-247.
- Florencia Ferreira De Cassone, *Claridad y el Internacionalismo Americano*, Editorial Claridad, 1998, Buenos Aires.
- Georges Fischer, "Un trait d' union; Annie Besant", en *Tiers Monde*, No. 58, Tomo XV, Paris, 1974.
- Manuel Gálvez, *Vida de Hipólito Yrigoyen. El hombre del Misterio*, Edición del Autor, Buenos Aires (segunda edición), 1939.
- Manuel Gandarillas, "Lin Yutang, Encrucijada de Oriente y Occidente", *El Viaje* (Santiago de Chile), No. 341, marzo, 1962, págs 19-20.
- Eduardo González Lanuza, "Lin Yutang: La Importancia de Vivir", *Sur* (Buenos Aires), No. 69, junio, 1940, págs 79-83.
- Ranjit Guha (ed.), *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1995*,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1998.
- 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Treinta años de Aprismo*, Fundación Navidad del Niño del Pueblo "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Lima, (Segunda edición), 1986.
- Vi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Excombatientes y Desocupados*, Ercilla, Santiago, 1936.
- Felipe Herrera, "Problemas d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en AA. VV.: *Israel visto por los chilenos*, Instituto Chileno-Israelí de Cultura, Santiago s/

f. 1961.

- Luis Heysen, "Por la Solidaridad con Todos los Pueblos y Clases Oprimidas del Mundo", *Apra* (Lima), No. 1, 12 de octubre, 1930, págs 15-16.
- Jorge Jaime, *Historia da Filosofia no Brasil* Vol. 2, UNISAL-Editora Vozes, Sao Paulo, 1999.
- Ramón Jahanbegloo, *Gandhi aux Sources de la Non-Violence*, Ed. du Felin, Paris, 1998.
- Sen Katayama, "Los Movimientos Obreros en el Japón", *Documentos del Progreso* (Buenos Aires), No. 2, 15 de agosto, 1919a, págs 10-11 (En el original aparece como Catayama).
- "El futuro de China", *Documentos del Progreso* (Buenos Aires), No. 7, 1 de noviembre, 1919b.
- "China y Japón", *Documentos del Progreso* (Buenos Aires), No. 9, 1 de diciembre, 1919c, pág 15.
- Fusanosuke Kuhara, "Fundamentos para un Partido Único", *Oriente y Occidente* (Buenos Aires), No. 31, Noviembre, 1941, págs 12-14.
- José Landa, *Hipólito Yrigoyen Visto por uno de sus Médicos*, Edición del autor, Buenos Aires, 1958.
- Edgardo Lander (editor), *La Colonialidad del Saber: Eurocentrismo y Ciencias Sociales. Perspectivas Latinoamericanas*, Unesco-Ucv, Caracas, 2000.
- Juan Mariátegui,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y el Continente Asiático (1923-1930)* Clenala, Lima, 1997.
- Mariátegui, Juan y Zevallos, Javier, *Nehru y la Política Exterior*, Clenalasaga, Lima, 1994.
- Julio Antonio Mella, *Documentos para su Vida (Primer Congreso Nacional de Estudiantes, Comisión Nacional Cubana de la Unesco, La Habana (Prólogo de Raúl Roa)*, 1964.
- Gabriela Mistral, *Recados para Hoy y para Mañana*, Sudamericana, Santiago, 2 volúmenes, 1999.
- Enrique Molina, *De lo Espiritual en la Vida Humana*, Editorial Nascimento, Santiago, (Segunda edición), 1947.
- J. Mutel, *Le Japon. La Fin du Shogunat et le Japon Meiji: 1853-1912*, Hatier Université, Paris, 1970.
- Jawaharlal Nehru, *Toward Freedom: The Autobiography of J. Nehru*, The John Day Company, New York, 1941.
- Jawaharlal Nehru, "Nuestra Época de Transición", *Cuadernos* (París), No. 36, mayo-junio, 1959, págs 3-8.
- Victoria Ocampo, "Palabras Inaugurales" Coloquio "Diálogo de las Culturas" (Buenos Aires, 29 noviembre-2 diciembre 1977), *Sur* (Buenos Aires), No. 342, enero-junio, 1978, págs 17-20.
- Kenichi Ohmae, *El Fin del Estado-Nación*, Andrés Bello, Santiago Chile, 1997.
- Jorge Orozco Cazorla, "Dos párrafos interesantes de una carta. Se unen los Maestros de los EEUU a la Internacional de Trabajadoras", *Repertorio Americano* (San José C. R.), Vol. 1, No. 8, 111 de diciembre, 1921, pág 124.
- Octavio Paz, *Los Privilegios de la Vista II. México en la Obra de Octavio Paz 7*,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1978.
- Lsmael Quiles, "Exposiciones y Diálogos", "Coloquio Diálogo de las Culturas" (Buenos Aires, 29 noviembre-2 diciembre 1977), *Sur* (Buenos Aires), No. 342, enero-junio, 1978, págs 155-158.
- Alfonso Reyes, Pedro Henríquez Ureña, *Correspondencia 1907-1914*,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éxico, (Edición de José Luis Martínez), 1986.
- M. N. Roy, *La India su Pasado, su Presente y su Porvenir*, s. p. i. México, 1918.
- Silvano Santander, *Yrigoyen*, Editorial La Fragua, Buenos Aires, 1965.
- Sukarno, "Mensaje de Sukarno", *Visión*, 8 de junio de 1956.
- Juan José Tablada, "Álbum del Extremo Oriente" (A Hyoshio Furukava),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8, 2ª quincena de abril, 1900, pág 114
- "Hacia el País del Sol: Sitios, Impresiones, Episodios",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13, 1ª quincena de julio, págs 200-203.
- "En el País del Sol: Episodios, Impresiones",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13, 1ª Quincena de julio, págs 200-203.
- "En el País del Sol",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19, 1ª quincena de octubre, págs 290-293.
- "En el País del Sol: los templos de la Shiba",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20, 2ª quincena de octubre, págs 312-315.
- "Un Entierro en el Japón",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21, 1ª quincena de noviembre, págs 333-336.
- "Un Matzuri",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22, 2ª quincena de noviembre, págs 342-344.
- "Cha-No-Yu", *Revista Moderna* (México), III, No. 24, 2ª uincena de diciembre, págs 370-373.
- Fernando Tola, Carmen Dragonetti, "Lo que la filosofía de la India le debe a Hegel", *Pensamiento* (Madrid), Vol. 58, No. 222, septiembre-diciembre, 2002, págs 353-385.
- José Vasconcelos, *Estudios Indostánicos*, Botas, México, 3ª edición; (1ª edición 1920), 1938.
- Volker Wunderlich, *Sandino. Una Biografía Política*, Nueva Nicaragua, Managua, 1995.
- Muhammad Yunus, *Hacia un Mundo Sin Pobreza*, Andrés Bello, Santiago, 2000.
- Leopoldo Zea, *América en la Historia*, Ediciones Revista de Occidente, Madrid, 1970, primera edición 1957.
- Leopoldo Zea, "Prólogo a Rizal", José: *Noli me Tangere*, Biblioteca Ayacucho, Caracas, 1982.